M119出土部分器物

考古中国主题宣传

M75出土靴形尊

M77出土金耳环玉石器

外环壕出土陶鬲

H74出土陶甗

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屈家岭文化葬仪和治水的研究样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荆门市博物馆 沙洋县文物保护中心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十三组和龙垱村三组，地处汉江西侧、长湖北岸，南距荆州古城约40千米，北距荆门市50千米，东北距沙洋县城20千米，东南距汉宜公路3千米。城河及其支流分别流经遗址的西、南及东侧，于遗址东南方位汇合。

该遗址最初发现于1983年，当时被命名为“草家湾遗址”，同时根据采集到的陶片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10月，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复查，推测该遗址可能为史前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并将遗址更名为“城河遗址”。

为开展长江中游地区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特征和社会结构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现沙洋县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

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的支持下，联合考古队确认该遗址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并对城内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城外墓葬区、城内人工水系，乃至与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揭露。通过区域系统调查，联合考古队对周边聚落形态也有了全面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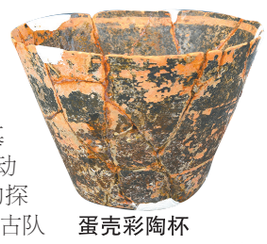
新的发掘收获为城河遗址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在对王家墙墓地实施发掘的过程中，联合考古队注意到墓葬呈单元状分布，且随葬品形制和组合亦存在差异，意味着屈家岭文化的葬仪可能存在不同。另一方面，微地貌勘探和观测显示，遗址北部区域为高岗，如果不经过人工改造，城外河谷的水资源无法穿过高岗进入城内。

同时，以早期卫星影片为线索，联合考古队在城河遗址开展的航测、反复勘探过程中，注意到在城内西部“屋场”地点（西城墙内侧80米左右）似乎存在一条垄状堆积，怀疑可能为早期的人工堆积，但对其年代、堆积方式和形成原因不甚清楚。

为解决上述问题，联合考古队以王家墙墓地的系统发掘为支点，以城河遗址北部区域的系统勘探和调查为抓手，以探索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把握屈家岭文化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为目标，对王家墙地点和城河遗址北部、西部区域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具体收获如下。

石钺

器盖


蛋壳彩陶杯

屈家岭文化治水模式的新探索

史前治水模式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屈家岭文化盘踞在多雨多水的长江中游，其是否存在水利设施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2017年以来，联合考古队与刘建国研究员合作，对长江中游史前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测和建模分析，并提出这些史前城址不仅防洪而且抗旱，是史前水利设施的物质体现。然而，初步的研究显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治水方式并非完全一致，不同聚落之间有所不同。迄今的考古工作表明，屈家岭文化时期，城河先民采用了拦河储水、筑墙防水、壕堰蓄水等多种水资源利用的方式。

拦河储水 联合考古队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航测、年代学、环境考古的专家，在城河遗址北部区域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对北部区域若干疑似水利设施进行勘探。经过系统勘探和对十四处地点解剖，在城外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发现一处明确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积。该堆积隆起于地面，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东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解剖结果显示，该堆积由人工堆筑而成，目前可见17层，每层厚度为20~90厘米不等。结合勘探信息，初步认为该堆积为屈家岭文化的“水坝”设施，用于拦截城河支流水资源，北部区域是城河城的蓄水区。

水坝将城河支流的水位抬升，形成事实上的“水库”。水资源借助北部岗地的人工通沟进入城内，旱季供水，涝季排水。

筑墙防水 除了在北部区域修建“水坝”、拦截河水、形成“水库”之外，城河先民还采用“筑墙防水”的策略。数字高程的研究发现，城河遗址西南区域为典型的河谷特征，应该是早期城河干流摆动形成的河谷遗迹（刘建国等，2023年）。古地貌学和古环境的观察也显示，该区域为大规模的沼泽地，可能与早期河谷的摆动存在关联。为扩展聚落空间，城河人把自然河流附近的台地切断，将河流向西南改道，在河谷形成的沼泽地中建立起一道弧形的人工设施，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城河城垣。由于自然河流在城垣外侧，梅雨季节很可能会发生外部水位上涨倒灌的情况，假设从城河遗址南部低洼地带开始，模拟水位逐渐增加后的淹没模型，就会发现现有自然河流的水位增加4米后，遗址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淹没，但城垣残存的最高部分尚未被淹没。换言之，如果城垣保存完整，就能够阻止自然河流的涨水进入到城内，进而保护城内先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壕堰蓄水 蓄水抗旱是农业聚落的重要活动。在城河遗址，不仅北部“水库”能够蓄水，城外的壕沟同样能够蓄水。近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外西部壕沟中存在三条呈东西向、连接沟岸的“生土梁”。这些“生土梁”由北向南逐级分布，与现代滚水坝的空间特征和功能极为接近。由于这些土梁均为生土，其上无文化层叠压，故无法直接获取年代信息。不过，考虑到土梁坐落于壕沟内部，而壕沟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因此我们推测这些土梁应是在城壕规划和修建阶段形成的设施。

屈家岭文化葬仪的新认识

王家墙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发现较缺乏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近年的考古工作进一步廓清王家墙地点的营建过程。墓地形成之前，城河先民对自然台地进行了平整，局部区域实施了人工铺垫；墓地兴盛时期，在墓地中、南侧的空白地带开展了以祭祀坑、祭祀沟、黑灰土为物质遗存的仪式性活动；墓地使用和废弃之后，墓地南部区域分布有房址、灰坑、灰沟等遗存。

在墓地的最新发掘过程中，发现新形式的独木棺、“一棺独享”的大墓、棺椁齐备的小型墓葬、小型合葬墓等墓葬形制，并发现墓葬中不同部位的置钺现象，提供了屈家岭文化葬仪的新认识。

聚落结构的新发现

在城河遗址西部城墙内侧，即遗址西部区域的勘探过程中，发现疑似人工垄状堆积。根据叠压于人工堆积之上的灰坑、灰沟、文化层初步判断，该堆积的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早期卫星影像分析和田野勘探工作表明，此垄状堆积呈半圆弧线段，与中部台地构成封闭空间。从已暴露的部分堆积特征分析，此堆积与城河遗址早前发现的城垣、水坝的堆积结构、性状相似，加之堆积东西两侧有平行的大型壕沟，故不排除该堆积为早期城垣或防水设施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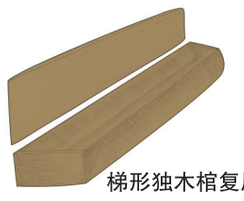
城河遗址新进展的学术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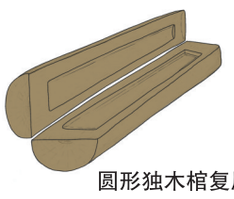
城河遗址的治水模式的探索，为史前单个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拦河储水、筑墙防水、壕堰蓄水等多层级管水用水方式，展现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呈现出史前治水“江汉特征”。此外，城内西部区域垄状“人工堆积”的发现，为探索城河遗址聚落结构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为探讨城河大型墓葬与居址的对应关系提供了支撑。

持续的发掘和研究显示，王家墙墓地拥有丰富多样的葬仪现象，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社群结构的复杂性，也意味着“社会分化”已经出现，“文明曙光”已经到来。这些葬仪与墓地内部的“单元地块”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联系，很可能反映了一种“大聚集、小分散”的埋葬制度，即城河的先民在某个时段都埋葬于王家墙这处公共墓地，但公共墓地内部可能存在以“族”划分的小单元埋葬形式。这与汉东地区石家河大城使用时期的埋葬制度明显不同，代表了汉水两岸的葬仪差异。此外，从大型合葬墓到“一棺独享”大型墓的发现，反映了屈家岭文化上层人物葬仪的区别或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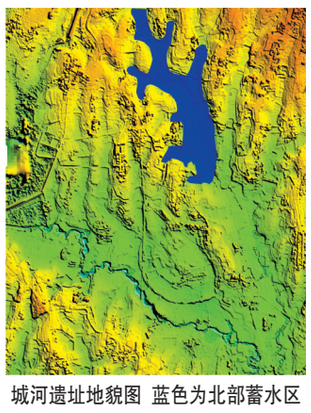
总之，城河遗址的考古新进展，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前治水的区域差异提供了关键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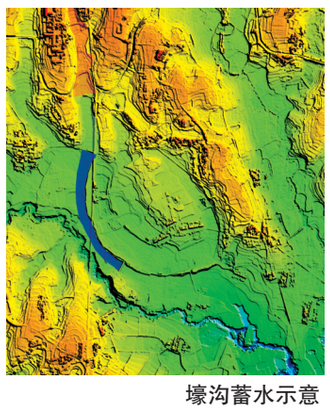
（执笔：彭小军 陶洋 范晓佩 唐国俊）


梯形独木棺复原


圆形独木棺复原

M118出土部分陶器组合


城河遗址地貌图 蓝色为北部蓄水区


壕沟蓄水示意

城河遗址鸟瞰图（南-北）

北京丰台新宫遗址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新宫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清代行宫新宫东北部，地处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古永定河流域的冲积扇平原。周围地形开阔，遗址择地古河道西南岸高垄台地，是北京市城区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夏商时期环壕聚落遗址，主体文化是大坨头文化（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包括双环壕、祭祀遗存、墓地、古河道等，亦发现有晚商西周时期墓葬、灰坑、窖穴和沟，战汉时期墓葬、沟，辽金、明清时期道路，明清灶址等不同时期遗迹。

项目概况

该遗址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发现。2022年4月至2023年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该项目范围内发现的古代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2023年5月，被列入考古中国新发现项目之一，该遗址现存面积约4.5万平方米，历时两年度发掘面积约16000平方米。

地层堆积

根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发掘区内的地层可分为七层，第①层为现代垫土层，厚约8～50厘米。第②层为清代层，厚约10～30厘米，可辨器形有青花碗、盘等器物的残片。第③层为明代层，厚约15～50厘米，出土有明代碎砖块、瓦片及明代瓷片等，可辨器形有瓷杯、瓷碗底部残片、瓷罐等器物的残片，并出有辽金时期的瓷片。第④层为汉代层，厚约18～60厘米，出土有布纹板瓦残片、绳纹青砖残块及零星的商周时期的夹砂灰陶、褐陶和泥质灰陶等残片。第⑤层为西周层。⑤a层，厚约0～40厘米，分布于探方内的西北部。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夹砂陶较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弦纹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等器物的残片，并出有钻孔残石器等小件器物。⑤b层厚约15～55厘米，遍布全探方。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中夹砂陶居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盆等器物的残片。第⑥层为商代地层，厚20～70厘米，土质疏松，土色深灰，遍布全探方，该层下的大部为黄色含粉砂黏性水锈层。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中夹砂陶居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网格纹、戳刺纹、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甑底等器物的残片。第⑦层为商代早期层，厚约10～40厘米，土质较硬，土色深灰。出土有泥质灰陶、红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纹饰有绳纹，可辨器形有罐等器物的残片。

主要收获

大坨头文化遗存

环壕 发现内、外两重环壕，两条环壕大致呈同心圆围合而成，两环壕之间相距20～25米。内环壕位于遗址核心区域，现存宽12～18、深约4、直径约70～72米，围合面积约0.4万平方米。内环壕西南部有一进出口处，现存宽约6米。其东部段被后期坡毁严重，西北、西南部保存较好。外环壕现存宽5～8、深约3、直径142～155米，围合面积约1.7万平方米。外壕上层不同区域段分别被晚商西周、战汉、明清、现代地层叠压破坏，西北部相对保存较好，出入口应当与内环壕西南方位相对应，其界出发掘区外为现状路区域。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陶片、科技提取相关遗物检测分析，两条壕沟的营建、使用、废弃年代大致均为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

祭祀遗存 在内环壕接近中心位置，发现一处上层平面呈同心圆夯土遗迹，整体结构大致呈外圆内方，开口于近现代层①层下，由内及外共三圈，土质土色有明显区别，直径分别约为2.3、5.9、7.9米。夯填土内不同区域发现有集中堆放陶片、兽骨、炭化痕迹、有意摆放石块等现象。夯土遗迹中心有一用大小不一青色片石砌筑的方坑，边长约1.2米，上下通体一致，深距现地表7.3米。方坑内从上至下不同层都有陶片、兽骨、炭化腐殖等堆积，尤其底部出土大量陶片、石块、兽骨、炭化植物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鬲、尊、甑、盆、钵等，陶器（片）多见被火烧痕迹现象。方坑底部四边位用片石砌筑，其下还保存有用于加固的圆木搭构成方框状紧贴片石砌筑内侧。这处核心遗迹周围发现排列有序、大小不一的坑，一部分较小的圆坑其直径大小大致相同，坑内可见炭化植物、兽骨，个别出土石器、陶片，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甗、盆等。这处营建和形制较为特殊的遗迹是目前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初步认为这些坑与祭祀类特殊活动有关，这个外圆中部似方琮状上下直通的核心遗迹（K1）。K2，在内环壕西北部紧贴壕外侧，开口于晚商西周层地层⑤层下，坑平面大致呈弧角方形，口小底大，坑口南北长3.3、东西宽2.9米，坑底南北长3.45、东西宽3.1米，现存坑深0.85米。坑内有人骨一具，人骨距坑底0.2米，头向西南，呈俯首侧爬状，右臂及手侧压于身下，左手握拳，经鉴定为一男性，年龄25~30岁。人骨头部有击打痕，坑壁及发现人骨层位有火烧痕迹，初步判断为人祭行为。

墓地 墓葬区位于外环壕（G3）外东南部，已发掘竖穴土坑墓29座。墓葬整体规划有序，墓向基本为头东脚西，开口于近现代地层下，其上部均被后期活动破坏，大多仅存墓底部分。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多为素面折肩鬲、宽沿折腹盆、尊、上腹饰旋纹三足鼎、钵等，另外部分墓葬随葬有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玉髓坠珠等遗物，尤其是M75出土的靴形足彩绘陶尊和M77出土的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等重要文物，弥足珍贵。墓主人应具有较高的等级身份。这批墓葬整体出土遗物丰富，为目前燕山南麓最为重要的一处大坨头文化墓地。

K1祭祀遗存解剖照

外环壕剖面

晚商西周聚落遗存

在环壕内外及环壕上层均发现有灰坑、窖穴、灰沟等遗迹，被后期活动严重破坏，不同区域遗迹单位开口文化地层不完全统一，遗迹多仅存底部。灰坑多见袋状圜底或平底，为环壕废弃后的遗存，出土有陶片、陶纺轮、兽骨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盆、罐、豆、簋等，其器形、纹饰、陶质等与大坨头文化时期不同，年代相当于晚商西周时期。在外环壕东北部发现一处西周时期墓地，由出土物及墓葬形制初步认定该处墓地墓主人身份地位较低。

古河道

新宫遗址东北部发现一条古河道，自西北向东南流过，开口于战汉地层下，距现地表深约2米，淤积分层，河底见植物腐殖、粉砂、黑色淤泥等，鲜见陶片，河道宽约132～146米，深8～10米，该遗址与墓地都在古河道西南岸。河道沉积遗物及水流量缓急等诸多因素对环境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文献等方面的线索，推测这条河道或与永定河（古㶟水）故道有关。该河道的发现，为研究三代时期聚落的给排水系统、建设与布局提供了直接依据，并对探索古永定河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资料。

初步认识

新宫遗址大坨头文化双环壕及核心祭祀遗迹的发现显示该遗址是一处等级较高的祭祀性特殊遗址，是京津冀地区首次发现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功能、布局结构较为完整的祭祀遗址。这处祭祀遗存的选址和规模，反映出先民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并动用社会大量人力资源来完成此处具有特殊活动性质的场景。新宫遗址的祭坛为土坛，土坛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居多，如陶寺遗址祭坛、鹿台岗遗址祭坛、城头山遗址祭坛等，而北方地区大多为石坛，如赵宝沟遗址祭坛、东山嘴遗址祭坛、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祭坛等，皆砌有石墙基，土坛当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其使用、延用时空及主导使用人群社会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喇叭口耳环可能与分布在叶尼塞河以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但考虑到这类耳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较常见，可能直接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

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新宫遗址人群曾对粟、黍、稻等多种农作物进行过栽培和利用，并以粟作农业为主。5粒水稻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为探讨先秦时期北京地区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肉食水平略高于二里头遗址人群，有着丰富的肉食来源，包括蚌科、蛙科、鸡、狗、驴、猪、梅花鹿、黄牛、羊、鱼等10多种动物，且发现了食物加工的痕迹。不同等级墓葬的墓主人之间饮食结构差异不大。新宫遗址存在迁徙现象，发现外来人类个体以及南方和东边牛、猪、鹿等。该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大坨头文化的时空范围、人群与族属、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古河道将近150米宽，距现地表深10米左右。环境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当时水流较缓，周边环境很适宜先民临水而居，这条河也为周边农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水资源。

价值意义

新宫遗址文化年代久远，文化延续性强，叠压打破关系明显，出土的文物既包含土著文化雪山三期、塔照类型、张营类型等多种文化因素，又受到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二里头、二里岗等文化的影响，填补了北京城区夏商时期历史文化面貌的空白，是一处体现多元一体文明中文化融合现象的典型遗址。

尤为突出的是发现大坨头文化等级较高的墓地，出土了陶器、石器、金器、铜器、玉器、骨器等大量文物，最具代表性的靴形足彩绘陶尊、彩绘陶罐、折肩陶尊、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喇叭口铜耳环、红玉髓珠坠、绿松石项饰等珍贵文物，为认识大坨头文化的社会性质、文明、文化面貌、社会组织结构、生业经济发展水平及宗教信仰礼仪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同时，新宫遗址发现的晚商西周时期聚落遗存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厘清学界论证的围坊三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及燕文化在北京地区的存续与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探寻西周封燕之前北京古方国薊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此外，本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其中发现的战汉、辽金、明清等时期的墓葬、道路、灶迹等诸多遗存同样为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历史研究等贡献了翔实的新资料。

（执笔：韩鸿业）